

论田汉对新文学“社会改造”意涵的探索

席艺洋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田汉宣布“左转”。但这一转变却并非突变，实则有着更早的思想积累。五四时期，田汉曾认为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分别代表了“诗歌的运动”和“劳动的运动”，两者结合则代表了新文学未来的趋势。在他“通过文学改造社会”的构想中，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有望成为改变人类未来境遇的新方案：它连通科学、唯物史观等观念，在风格上有着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的倾向，在内容上关注劳动问题。田汉这段早期的思想之旅难免还有不成熟之处，但他关于文学和社会改造之间关系的探索，却在跨文化的对话中勾勒出了公平、民主的新社会图景。这一不太被关注的过程最终转化为田汉特殊的思想资源，成为影响他“左转”的深层原因之一。

关键词 田汉；社会改造；“五四”新文学；自然主义；社会主义

如何处理知识和实践的关系，是诸多左翼文化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追问。长文《我们的自己批判》通常被视作田汉“左转”的主要标志。不过，田汉的转向并不能用从浪漫的“波西米亚”文人到“革命者”的逻辑简单概括。因为这一变化看似急剧，实则暗含诸多一以贯之的知识和文化脉络。导致田汉转向的原因分布在不同时期，涉及国内外革命潮流、文艺界的氛围、田汉的人生际遇，又与各种革命团体、知识群体等产生过互动^[1]。相关研究已有不少扎实的成果。不过，关于“文学”（田汉的文学观念、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以及“社会”（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改造观念）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却较少被论及。在探索田汉这一段早期的思想之旅前，我们首先需要注意“转向”背后关于中国文学转型的图景：从新文化运动至30年代，中国文学在内容、风格等方面的转型过程复杂而丰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社会改造”到“社会革命”，这些看似断裂的阶段，却内嵌连续性。

除此之外，这幅图景还包含着另一值得注意的风景。“五四”前后，社会改造思想对文学题材的影响有着较清晰的表现，它主要涉及个人自由、家庭与社会间的关系。但与之相比，一种更隐匿的特质，则是关于知识人将文学置于社会运动的框架，

透过文学带动社会变革的构想。五四时期，身处东京的田汉在研读世界文学的同时，亦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将两者视作独立的研究范畴，而是尝试寻找它们深入联结的可能性。

因此，重新考察田汉早期的文学观念如何与社会想象互动，就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回望“五四”思想背后的跨国知识流动和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传播状况，亦有助于我们反思左翼文化运动的内在逻辑。社会改造的思想经由田汉一系列的文学翻译活动，以别样的形式逐渐转化为一种浪漫与现实倾向相结合的创作观，并影响着他对未来社会的想象。

一 文学为经，社会为纬： 自然主义与劳动诗学的社会面向

五四时期，田汉关于文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判断一直未被足够注意，却颇为重要。通过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社会和文学潮流的考察，田汉在长文《诗人与劳动问题》中指出：“诗国的大革命”与诸多社会“革命史”有关。比如文学中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田汉受日文影响译作“拟古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应的关系；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田汉译作“罗曼主义”)和民主的流变亦如是。他猜想,文学主潮和社会结构的相互激荡中,或许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据他判断,自然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将分别代表文学和社会的趋势,影响中国的未来^[2]。如今观之,田汉的判断似乎只对了一半,因为中国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但自然主义却未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

然而,田汉的看似错判,却甚是关键。原因在于这种思想轨迹,实则隐含着早期新文学运动寻求文学转型时跨越文化及学科藩篱的独特视野。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新村”、“工读互助”、平民教育、社会调查等实践不仅渗透到了社会思想领域,亦曾在文学界引发知识人对早期新文学形态、观念、走向等问题的思考^[3]。如何以文学联动社会?怎样借助文化重建政治?这是包括田汉在内的知识人密切关注的。尽管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在20年代逐渐走向分离,但两者早期的融合,却已在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中留下了思想遗产^[4]。从这一层面上看,左翼文化运动的发端和展开依然和“五四”知识界对文学和社会关系探索的前期积累不无关系。

那么,田汉关于中国社会未来变革的思考有着怎样的思想渊源?首先,“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令田汉想象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倘若要改变中国,就必须参与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再者,田汉在“左转”前有着一段关于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交互研究的经历,它始于“五四”前后,并大致延续到20年代末。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带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可思母俱乐部”等社团影响下,田汉不仅结识了身兼社会运动家和剧作家的秋田雨雀,还接触到了日本的劳工运动。

在知识界崇尚“进化”和“创造”观念的文化语境中,劳动这一古已有之的行为,却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田汉等知识人的视野。在日本,荒畑寒村、贺川丰彦、麻生久、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纷纷表现了对“劳动”的关注。平林初之辅的劳动文学观较具代表性,从他被称为“劳动小说家”和“文坛私小说家”可以看出,表现社会问题的劳动小说、无产阶级文学和从自然主义中生成的日本私

小说具有混杂的特质,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边界^[5]。在穆尔顿(Richard Green Moulton)的《文学的现代研究》(*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中,田汉读到了相似的观点:诗歌是一种创造文学。这种创造性还能在劳动者之歌中找到^[6]。同时期,“五四”知识人也在民间征集歌谣,令民间诗歌在新文学中成为具有活力的资源^[7]。负载着新文学重任的诗人应该成为“创造者”,从这一角度看,尽管诗人和劳动者看似关注的事物相差甚远,在“创造”层面上却是相似的。

田汉对文学和社会改造关系的探索,伴随着他对中国文学如何如自然般“进化”的跨界思考。但怎样的文学才是具有创造性,并且符合“进化”趋势的呢?如前所述,田汉认为文学界的变革很可能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展开。自然主义发端于法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思潮在欧洲日渐衰落,却得以在日本传播^[8]。在中国,1904年《大陆》刊发的《文学勇将阿密昭拉传》中,已出现关于自然主义的介绍^[9]。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指出,自然主义是“直接描写人生自然真相”的写作方法^[10]。但是,倘若我们将这种思潮的传播局限于创作方法的范畴,便会错失它在“五四”时期丰富的社会意涵。

知识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是产生自然主义等文艺思潮的主要原因^[11]。也因此,文学范畴的自然主义在传播中被赋予了科学、进步色彩。鲁迅曾翻译片山孤村的《自然主义之理论及技巧》^[12];茅盾也曾以《小说月报》为载体提倡过自然主义^[13];而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也翻译过自然主义文论。田汉对自然主义的兴趣始于日本,彼时,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德田秋声等人成为了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14]。有留法背景的永井荷风曾效仿左拉,创作了《地狱之花》等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15]。在日本诸多相关的讨论中,日本新剧运动的先驱——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曾详细介绍自然主义在欧洲及日本的概况。晓风(陈望道)在1921年将此文译出,刊于《小说月报》,是五四时期较早对自然主义进行系统介绍的译文之一。

岛村此文也引起了田汉的注意,1920年,田

汉就已译介文中的主要观点，并以此建立起对自然主义的初步认识。岛村认为，文学可以在心理学、生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他主张文学应是一种真实的告白，作家可以书写肉欲和大胆忏悔，摒弃一切虚假和矫饰^[16]。田汉通过对岛村的阅读，了解到自然主义在日本之所以崭露头角，源自文学对事物内在的本性的书写；而厨川白村关于自然主义文学特质的论述，则向田汉提供了更具体的创作方法，并引发他思考创作背后的社会动因。据厨川白村分析，“科学的制作方法”是自然主义的首要特质，关于这点，田汉曾有颇详细的引述。他指出所谓自然主义“科学的制作”都与描写有关。比如，作家需要像科学家般冷静观察人和社会，既可结合生理学知识描写人的疾病，又可延伸至书写现代社会的阴暗面^[17]。此外，厨川还在《苦闷的象征》中视自然主义为社会改造运动的先驱，这很可能影响了田汉对自然主义社会功能的理解。

二 从“自然”到“社会”： 自然主义的跨文化阐释

在关于自然主义思潮的早期探索阶段，田汉对岛村抱月和厨川白村的自然主义观念皆奉为研习的对象。他认为自然主义对人和社会观察的方法体现了未来文学的走向：其一，是捕捉自然的真；其二，用自然的方法观察社会。这明显带有日本自然主义的印记。然而，在日本自然主义的知识脉络中，却也存在内部差异。尽管岛村关于自然主义的主张和法国自然主义一样有着社会的关照，但同时，他亦发现了法国自然主义极端化的局限。在《被束缚的文艺》中，他认为尽管法国自然主义开创了伟大的时代，但用自然的本真状态描写自然的方法过分受制于知识，反而逐渐走向极端；他所倡导的，是令自然主义回归不加粉饰的情感本原^[18]。而对厨川白村来说，日本自然主义也应被修正。他既反对左拉极端的自然主义描写论，又反对日本自然主义的平面描写论，认为浮于表面的描写不能成为“生命的艺术”打动人心^[19]。

五四时期，田汉试图在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思考自然主义的作用。自然主义与诸多文学潮流有关

联，其中，它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田汉认识自然主义的视角。19世纪时，自然主义文学的流变伴随着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和对抗^[20]。尽管如此，田汉看待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二者关系时并未以“新潮代替旧潮”的逻辑简单概括。他注意到浪漫主义一方面将艺术平民化，另一方面又使艺术返于自然；它不仅刺激了文艺的诸多变化，还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等社会变革^[21]。在他看来，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只是不同时代的文学主潮，在不同时代，分别承载了各自的社会角色而已。

另外，田汉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观念存在一定的混同性。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文学史中是有所区分的，但两者在五四时期却常被混用。从巴尔扎克到左拉，细节描写所呈现的环境，能够定位人物的阶层和社会差异^[22]。从这一层面看，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二者的确有一脉相承之处。在发轫之初，法国自然主义被视作现实主义的延伸或现实主义的高峰。左拉有意混同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正是基于文学运动的考量。因为由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奠定的写实传统曾长期占据西方文学的主导地位。左拉援引传统资源为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3]。岛村抱月既看到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亲缘关系，但也主张将自然主义的定义还原到描写自然之真。而这一变化，正是法国自然主义经过翻译，在日本重新产生变异的特色。

从自然主义的传播系谱观之，法国自然主义在传播到日本后已经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日本长期混淆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界限^[24]。这很可能是田汉混淆两者的主因之一。岛村认为：“自然主义重在写真（Truth），真的一语是自然主义底生命。”^[25]依岛村的解释，“写真”包括书写“社会问题、个人解放或根本的道德问题”等，其中，“社会问题”指的是“饮酒、色欲、贫困等如何导致堕落和死亡”^[26]。不过，田汉似乎并未将岛村的理念付诸于实践。具体而言，他将自然主义视作现实主义脉络中的产物，但没有按照岛村对日本自然主义作品中“社会问题”定义的指导进行创作。

尽管如此，这一认识的过程却提示了，田汉已将自然主义、劳动问题这两者看似联系不多的议题

联结了起来。五四前后，中国工业有所发展，产业劳动者迅速增长，劳动也成为了知识界关注的问题^[27]。蔡元培手书的“劳工神圣”刊于《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引发知识界关注^[28]。不过，田汉指出，尽管“劳工神圣”成了流行语，但人们却未必认识劳动者疾苦的根源^[29]。可见，他已意识到诸多相关的讨论还浮于表面。

田汉意识到劳动本应是自然的法则，这与左拉的初衷形成了遥远的呼应。左拉曾在演讲中谈到科学、劳动和人生的关系，指出科学揭示的是真理，而要想触及真理则需要自我克制。人类的生命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人生来就是需要劳作^[30]。他将人类的劳作视为重要的自然法则，但也透着些许感伤。然而，田汉对此的解释却更乐观。他认为，左拉所谓“社会各员都负担他那相当的工作的，健全而伟大的社会，不就是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所理想的社会吗？”^[31]。由此，从法国的左拉到身处东京、面向中国写作的田汉，“劳动”一词得以生成了新的意义：它不仅关乎个体价值的实现，也关乎如何兼顾群体的追求；它不仅是自然运转需要遵循的环节，更关乎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

那么，田汉又是否一如左拉，视劳动为人类整体命运中的重要环节？关于这点，田汉的翻译活动向我们揭示了他的部分观点。在读过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的成员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社会主义的民谣与抒情诗》（*Ballads and Lyrics of Socialism, 1883—1908*）后，田汉将其中多首译出。诗作大多描写的是工业社会对人们身心的双重打击。在《病新闻记者》（*The sick journalist*）中，田汉译道：

不错——我虽然还能够受苦，但是我不能再用心了，暖炉里没有一点火星。^[32]

除了这类诉说知识人内心绝望的诗句，还有一类带有鼓动意味的作品。如田汉在《等到天亮了》（“*Until the day break...*”）译道：

当黑暗之中他们还信仰有太阳一个，看我们的朝霞如火，便证明了他们的信仰不错！^[33]

尽管田汉翻译的是内斯比特 20 年前的诗作，却依然感受到了诗人的社会关怀。诗人笔下既有体力

劳动者，又有田汉所谓“劳心劳动者”——知识群体。这令田汉想到“人类最大的职务在为世界创一种健全的文明”，但文明不仅是物质生产，它亦关乎知识群体在“精神生产”中的创造性与批判性角色^[34]。田汉后来在“南国艺术运动”中注重培养艺术家、倡导独立的艺术教育，或许正是遵循了这样的信念^[35]。而在内斯比特诗歌问世后的几十年间，“精神生产”和自然科学的边界不断在中国的文化转型中被逾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创造”？

回溯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社会文化变革，便可认识到科学曾为人文学科和社会思想带来的新诠释。正如法布尔《昆虫记》的日文译者大杉荣、椎名其二曾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而鲁迅又是在读过此日译本后，借昆虫批判彼时的国民性^[36]。无论在英文还是法文中，“自然主义者”通常意味着“自然的研究者”。由此，也意味着自然主义作家其实和动、植物学家之间建立起了相似性^[37]。在《实验小说论》（*Le Roman expérimental*）中，左拉表露出研究生理学的经历。而在世界文学的流通中，文学对自然科学的跨文化阐释，对关注社会改造的田汉有着特殊的意义。

五四前后，日本知识界已出现关于将生物学中的“利他”“互助”观念引入社会建构的讨论。田汉在坪内逍遙的《近世文学思潮之源流》中，就读到了“社会的罗曼主义”是“利他的”，为社会整体的爱^[38]之类的内容。另外，高畠素之的著述也曾引起包括李达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39]。高畠素之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的“克鲁泡特金相互扶助论”一章中，曾谈到动物的相互扶助，这成为田汉关于竞争和协同观念的来源之一^[40]。田汉指出，存在互助行为的动物在“智力和体力也必较其他动物发达些”^[41]。利他和互助观念是田汉理解“道德演化”的重要环节，而这也正是田汉认为社会主义符合自然法则，能导致社会进入更高阶段的原因之一。

青年田汉的志向是成为“a budding Ibsen in China”（中国崭露头角的易卜生）^[42]。易卜生的《群鬼》曾是田汉带领南国社多次演出的剧目。尽管易卜生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开拓者，但《群鬼》同时也是一部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剧作^[43]。

在一定程度上，它影射了遗传的不幸，但这种遗传不仅关乎身体，更关乎道德。这种观念亦存在于同时期的其他世界文学作品中，如西班牙剧作家何塞·埃切加赖（田译“叶辙嘉宁”，José Echegaray）《唐璜之子》（田译《唐长之子》，*Son of Don Juan*）、挪威作家比昂松（田译“皮尔孙”，Bjørnstjerne Bjørnson）《库尔兹的家产》（田译《克尔特族之传代》，*The Heritage of the Kurts*）等。这些世界文学作品中关于人性遗传的内容之所以引起包括田汉等知识人的注意，主要原因在于在20世纪初，遗传问题已受到社会主义者的关注。

不过，诠释遗传却并非田汉等知识人的目标。如何发现遗传的规律，又怎样制造有利的改变？这些才是他们更倾向于了解的。日本文学界对此已展开了讨论，正如永井荷风所言，人的社会行为由生物本能支配。因此，若要建立理想的人生，科学便可以成为文学家与旧道德斗争的武器^[44]。可见，以科学映照文学、又从文学进入现实剖析的过程，恰恰向田汉展现了自然主义对于现实的批判意义。

三 文学的“人生观”： 社会思潮的跨越性思考

五四时期，田汉十分关注自然主义与劳动问题相结合的可能性，而两者“跨界”的联合其实在左拉的作品中早已出现。从《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的别名“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可见，自然及社会史在左拉的文学观中的特殊地位。据田汉观察，描写劳动社会的《酒店》（又译作《小酒店》）和描写矿工的《萌芽》（田译为《阳春》）“尤以写资本家和劳动家的冲突为主”。两者之所以特别，在于它们对劳动者生活的“写实”^[45]。由此，劳动也就成为了田汉理解自然主义的特殊的切入点。与描摹贵族生活的作品相比，左拉对底层劳动者生活的刻画犹如在黑暗中划出了一道光。它不仅意味着作家以新的方式书写长期受冷遇的题材，还关乎作品“为谁而写”的叩问。

虽然田汉并没有因为研究自然主义而创作相似风格的作品，但这却成为了他联结文学和社会的中介。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为他拓宽了关于社会主

义视野。田汉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接触主要始于1916至1922年的留日时期。日本早在19世纪末已出现社会主义传播。特别是日俄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思想随着幸德秋水、堺利彦、片山潜等宣扬的反战思想迅速传播^[46]。20世纪初，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社会主义论著已出现中译本^[47]。彼时，知识人认为社会主义有助于推动有组织的社会改造^[48]。这样的图景，对田汉尤有吸引力。

五四前后，田汉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带有世界主义倾向的社团等影响下接触了日本劳工运动。他曾与日本“新人会”的成员一同到工厂发表演说^[49]。在东京“可思母俱乐部”（コスモ俱樂部，Cosmo-Club），他得以近距离接触到堺利彦、宫崎龙介等社会运动家^[50]。也正是在那里，田汉首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并称之为“劳动者”的《圣经》。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东亚诸民族知识人的交流机关，“可思母”意味着“创造无国境的新世界，新生命”^[51]。正是在此时期，田汉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社会运动家贺川丰彦的论著^[52]。田汉在试图向《少年中国》的读者勾勒出“劳动运动”的历史时，译介了贺川丰彦《阶级斗争史》中勾勒出的世界变革：无论俄国解放“农奴”，还是美国解放“黑奴”、德国产生“职工联合”等，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劳工运动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53]。但是，田汉却并未止步于此。在了解无产阶级对劳动运动的作用后，田汉还尝试推之于文学史。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革命终需要触及劳动的异化性质，走向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革命^[54]。阶级理论是“五四”知识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主流途径。不过，和单纯的学理分析不同，田汉却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参照，解读文学的生产机制。田汉因为英国作家斯麦尔斯（Samuel Smiles）在《人生与劳动》（*Life and Labour*）中的观点而受到启发：“白屋所产的公卿决不少于钟鸣鼎食之家”^[55]。同时，他还以麦尔斯的分析为基础，尝试分析包括托尔斯泰（田译“脱尔斯泰”，Leo Tolstoy）、安德列耶夫（田译“安德侣夫”，

Leonid Andreyev)等18位西方作家的阶层^[56]。他将左拉、易卜生等纳入“劳动阶层”，并试图证明卓越的作家并不一定有着高贵的出身。

尽管田汉分析的方法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正尝试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视角看待劳动(无产)阶级的文学潜能。而除了从阶级理论对文学史的走向展开考察，田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学的跨界阐释还涉及唯物史观。他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最核心之处并非“由人的自觉决定他的生活法”，而是“由社会的生活法决定其人之自觉”^[57]。在他看来，社会环境决定人意识的“决定论”恰好可以解释左拉的创作方法。左拉创作的依据是决定论，“其物质的现象和社会的境遇，全可以科学方法测定之”，因而，这种创作方法正能体现“纯粹的唯物观的人生观”^[58]。也就是说，在田汉眼中，自然主义已不仅仅是文学思潮，还是蕴含“人生观”的社会思潮。

不过，文学中“唯物的人生观”这一联想却并非田汉原创，而是出自他对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中关于环境细节描写相关内容的引用：

自然派奉唯物的人生观，那么依进化论“应化”adaptation的法则，生物对于环境适者生存，人类无所谓volitional power(意志力)，只依extrinsic force(外力)而动。人体的精神的个性，全由milieu(环境)造出。^[59]

这段由田汉译自厨川白村的话揭示了环境在自然主义思潮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它也道出了田汉研究自然主义思潮，以及不断在文学思潮和社会改造潮流之间寻找共性的意图。正如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中所言，自然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描写出决定、造就人类的环境^[60]。由此，自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田汉心中显现了一致性——两者都强调科学、唯物，以及试图改变人类社会的境遇。自然主义作家不仅剖析人物的身体和心理的普遍性，更强调人物外部环境的书写，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对社会环境的分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从这种意义上看，文学中也就蕴含着“人生观”，甚至有可能介入社会改造。

然而，社会改造终需落实到人的改造，否则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对此，田汉早期的认识并

不清晰，而是经历了不断反思的过程。厨川白村曾提醒田汉要注重文学翻译，尤其是自然主义的翻译。他特别推荐田汉翻译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为“说日言社会改造，毕竟是要从个人改造起”^[61]。可能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受果戈里倡导的俄国“自然派”影响，厨川白村将他的作品纳入到了自然主义的范畴。虽然“个人改造”的对象包括社会中的个体，但作家更有其特殊的使命。田汉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席勒的剧作《强盗》中，体悟到文学中自由的呼声^[62]。但同时，田汉还注意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其中的影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风格的形成便与他“研究法兰西‘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有关^[63]。

田汉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过程导致他接触到它们背后的公有制观念和乌托邦思想，而这或许是他对“新村”运动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武者小路实笃的剧作《桃花源》勾勒出了他的“新村”理想。田汉曾翻译这部呼唤人道主义、反对暴力的剧作^[64]。他早年带领“南国社”自筹资金拍摄的电影《到民间去》也颇有将“新村”中国化的意味^[65]。虽然《到民间去》的底片已散失，但从田汉撰写的电影本事中还是能找到用劳动改造世界的“新村”模型。田汉将青年恋人奔赴的“新村”描绘成依靠劳动自食其力的“一切平等”之地^[66]。在“电影本事”中，主人公其昌在“新村”开始了筚路蓝缕的耕造生活：

其昌方锄于野，以健康之体躯，挥巨锄以向大地，其风貌有类Millet的画中人。斯时夕阳将下，晚风吹人，其昌发微叹后仍工作不已。^[67]

田汉称其昌像“Millet的画中人”，指的是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倚锄者》中的人物。画中农夫的耕作应该是迫于生计，而其昌却不太相同。尽管有着逃避个人情感的因素，但其昌这一人物更主要还是映照出包括田汉在内的知识人的想象：通过对社会成员自身的改造，继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在这一方面，田汉笔下的“新村”环境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新村”模型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中、日新村运动之间却又并非单纯的模仿关系。首先，“五四”时的“新村”在狭

义上指的是由日本传播而来的新村主义，广义上则是泛指未来的理想社会，它有着世界“大同”的传统渊源。再者，武者小路实笃提倡新村运动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暴力革命的出现。日本新村主义没有太多触动社会制度的强烈意识。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新村主义的实践者却往往以彻底改造社会为己任^[68]。虽然这种走向在田汉的早期思想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它却在田汉20年代后期的文艺思想中逐渐被转化和显现。

在20年代后期，田汉似乎已不再提“新村”。但由“新村”延续而来的社会改造思路却依然贯穿于他的实践中。田汉编译《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经历，正体现了他对文学作为社会实践的持续反思^[69]。“穆理斯”即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驱者、唯美主义作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70]。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上海》中，田汉的化身“克翰”正是莫里斯的崇拜者。他秉持“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信念，并对莫里斯在《来日》（The Day is Coming）中描绘的平等社会很是向往^[71]。

编译《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令田汉又一次触及“五四”时的劳动问题。田汉在书中收录了一篇他的译作——《无何有之乡消息》，此文译述自莫里斯的作品《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故事为中国读者呈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诸多不良后果，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对劳动如何导致社会分化的观察^[72]。小说中，阶级、权力和货币制度已消失，劳动不再是密集的机械生产或谋生手段，而是重返质朴的农耕和具有艺术性的手工劳作^[73]。这种从劳动、艺术引发的社会变革，何尝不是他在五四时期关于文学联动社会想象的另一种延续？

或许这就是为何田汉写道：“他（笔者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都由他爱重艺术，欲使生活艺术化之宏愿而来。”^[74]通过剖析莫里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田汉重申了他早年关于社会改造的思考：莫里斯“没有忘记劳动之快乐化，生活艺术化。更由此出发而否定从劳动者夺取快乐，从生活夺取美的资本主义，而图谋改造社会。”^[75]在此，田汉已发现莫里斯的用意——改造并非仅仅意

味着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它还呼唤着一种贴近生活、深入民众的文化事业。劳动“艺术化”并非为民众的精神愉悦而已，它还被想象成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如田汉所言，劳动有可能令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束缚的创造力重新释放，激发人心底“爱近邻、爱乡土之自然的人情”^[76]。这种由广大社会成员内心集结而成的力量，才是莫里斯倍加珍视的。

田汉对此深受触动，他眼中的莫里斯既是“浪漫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77]。这一评价，也正是田汉作为“舞台诗人”实践“人格就是诗”的写照^[78]。但同时，这也未尝不是他在时代洪流中的难题。莫里斯想象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自然过渡的，这与苏联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有很大的差异。尽管田汉对带有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双重色彩的《无何有之乡消息》表现出认同和赞誉，但另一方面，莫里斯的乌托邦“并非对于产业史之经济分析底结果”，而更像是他的人生观^[79]。因此，田汉在这种乌托邦中找到共鸣的同时，也可能对其中的适用性有所保留。不过，总体而言，艺术是莫里斯追求社会改造的潜在动力，与之相比，田汉何其相似？莫里斯的热忱提醒着田汉，知识人要将文艺与社会实践同时融入生命，并成为民众间的沟通者。这一观念令田汉对社会主义思潮和文艺大众化不断投入关注，并贯穿于他一生的创作。

结 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文学思潮、自然科学与社会思潮等不同范畴之间曾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跨越。田汉尝试将“自然”推之于社会规则、文学发展规律等范畴。他从文学向社会跨越的另一路径，则是左拉关于使用唯物人生观作为创作指导的观念。利用文学中关于劳动、社会底层的背景描写，能够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也就是具有唯物史观的小说。这些由自然主义、社会主义交互碰撞的思想火花，令田汉对文学的社会功用及其复杂性产生了新的认识。

尽管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并未出现对自然主义

的典型模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影响力的缺失。反之，自然主义实则有着一段别样的旅程，犹如“开过花却未结出硕果的树”^[80]。茅盾对自然主义的辩护和扬弃显示了自然主义的一种本土转化方式。同时，它还曾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田汉等知识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变革的想象。从法国自然主义的思想脉络观之，左拉以文学联动社会的方法是试图将小说构建成一种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精神的领域。但另一方面，文学书写毕竟有着个性化的因素，因此很难以科学法则为目标^[81]。这就是左拉虽开创了文学新潮，实验小说论却很难延续的原因。而在日本，从自然主义衍生出的“私小说”流露出自我告白式的书写，它逐渐偏离了对社会的批判，成为另一种独特的体裁^[82]。

反观田汉，他既试图透过法国自然主义，探索文学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法则，又从日本自然主义的潮流中，感受到自然主义对现实悲哀一面的暴露和文学中“真”的流露。可见，自然主义对田汉的影响并非只来自法、日、俄等具体国别，而是兼容并包的世界文学。因此，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重新考察田汉的翻译活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田汉“左转”的内在知识动因，继而反思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及社会变革之间复杂而特殊的对话过程。

这一过程中的不同源流，令我们看到“自然”并未简单转化成田汉对日本自然主义的复制，“劳动”诗学也没有单纯化作一种对底层民众劳动活动的描摹。自然主义不再是单纯的文学风格，而更像是为田汉连通中国文学和社会改造意涵的媒介；它从不同层面与现实社会秩序的对抗，令田汉在反思五四新文学的走向时产生了更多样的观察视角。

田汉的翻译和文学活动曾与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劳工运动、无政府主义、新村运动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等产生丰富的对话。它正反映了苏俄道路在中国被认同前，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知识人中曾有过别样的传播面貌。田汉文学追求的多面性，表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之处。他的剧作《灵光》改写自《浮士德》，在“新浪漫主义”、社会民主等思潮中形成了新的先锋追求^[83]。他常沉醉于唯美主义的感伤情调，却又难忘知识人的使命。他翻译王尔德具有唯美主

义风格的《莎乐美》，却又在唯美、颓废的情调中力求表达对既成社会观念的反抗^[84]。它们看似浪漫或颓废，实则将诸多观念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聚合^[85]。“社会改造”观念既曾在田汉所见证的日本近代剧运动中闪现，又曾在在他制作的那些兼具商业和政治特质的左翼电影中释放^[86]。这些文化脉络的背后，还流动着全球都市文化和世界主义的传播，为我们探索田汉的思想世界开辟了跨文化的研究空间^[87]。

随着新村运动、工读互助团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受挫，田汉也像不少知识人一样对“苏俄道路”产生了兴趣^[88]。他坦言：苏俄认为“艺术民众化”是“酿成无产者间的新势力之基础”。由此，“俄国新政府对于艺术民众化之努力”便吸引了他的注意^[89]。他围绕文学“社会改造”意涵和“艺术民众化”的探索在交互中勾勒出了公平、民主的新社会图景，这最终转化为特殊的思想资源，成为田汉投身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层原因之一。

[1] 刘平：《戏剧魂——田汉评传》，第250—2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董健：《田汉评传》，第26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田本相，吴卫民，宋宝珍：《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田汉传》，第87—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2][6][21][58]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1920年第1卷8期。

[3][4] 姜涛：《“社会改造”与“五四”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领域》，《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另参见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潘正文：《“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5] 大和田茂：《社会文学·一九二〇年前後：平林初之輔と同時代文学》，第34—47页、第188—199页，不二出版1992年版。

[7] 岳凯华：《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第308—319页，岳麓书社2006年版。

[8] 参见长谷川天溪：《自然主義》，第3—20页，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2年版；橋本治：《「自然主義」と呼ばれた

もの達》，第34—40页，朝日新闻出版2013年版。

[9] 蒋承勇、曾繁亨：《含混与区隔：自然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回眸》，《学术研究》2019年第7期。

[10][11] 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第266页，第27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2] 刘晓芳、木村阳子：《日本近现代文学史》，第70页，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3] 王向远：《“五·四”时期中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提倡与日本自然主义》，《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

[14]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刊行会编：《自然主义文学：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德田秋声》，有精堂1975年版。

[15] 相馬庸郎：《日本自然主义再考》，第24—25页，八木书店1981年版。

[16] 島村抱月：《文藝上の自然主義》，《人生と芸術》，第212页，進文館1919年版；島村抱月：《人生觀上の自然主義を論ず——『近代文藝の研究』の序に代へて》，《人生と芸術》，第218—231页，進文館1919年版。

[17][29][31][34][41][43][45][53][56][57]

[78]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续）》，《少年中国》1920年第1卷第9期。

[18] 赵仲明：《日本近代从自然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若干理论争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年11卷第2期。

[19][24] 叶渭渠：《日本小说史》，第217—222页，第2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 吕健忠、李爽学：《近代西洋文学：新古典主义迄现代》，第94页，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

[22] James Swenson, “Topographies”, in *Melancholies of Knowledg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Science*, ed. Margery Arent Safi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120–121.

[23] 曾繁亨、蒋承勇：《自然主义的文学史谱系考辨》，《文艺研究》2018年第3期。

[25] 島村抱月：《文艺上的自然主义》，晓风（陈望道）译，《小说月报》1921年12卷12号。

[26] 刘振瀛：《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

[27] 刘明达、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7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8] 见《新青年》1920年7卷6号。

[30] Philip Walker, *Zola*,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1985, p. 208.

[32][33] Edith Nesbit, *Ballads and Lyrics of Socialism: 1883-1908*, London: The Fabian Society, 1908, p. 30, p. 67.

[35] Xiaomei Chen, “Tian Han and the Nanguo Phenomenon: Networking the Personal, Communal, and the Culture”, in *Literary Societies in Republican China*, eds. Kirk Denton and Michel Hockx, Lexington Books, 2008, pp. 241–278.

[36] 彭小妍：《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九三〇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第232—277页，联经出版社2012年版。

[37] 吕健忠、李爽学：《近代西洋文学：新古典主义迄现代》，第93页，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

[38]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第23页；坪内雄藏述：《近世文学思想の源流：ルネサンス乃至ロマンチズム》，第54—106页，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9年版。

[39] 参见高阜素之著《社会问题总览》（李达译），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版。

[40] 高阜素之：《社会主义と進化論》，第48—54页，改造社1927年版。

[42] 田汉：《致沫若》，见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第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44] 永井荷風：《「地獄の花」跋》，《近代文学注釈大系》（第4），第16页，有精堂出版1965年版。

[46] 片山潜：《片山潜：歩いてきた道》，第171—193页，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0年版；大冢健洋编著：《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入門：原典で学ぶ19の思想》，第133—150页，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年版。另参见小正路淑泰编著：《堺利彦：初期社会主义思想の思想圏》，論創社2016年版。

[47] 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60—32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48]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68页，香港中和出版2011年版。

[49] 田汉：《忧愁夫人与姊姊》，《南国月刊》1929年1卷第1期。

[50] 寿昌（田汉）：《宫崎龙介及其它》，《三民周报》1927年第7期。

[51] 参见田汉《自传》，录于《田汉全集》（第20卷），第516页；松尾尊兌：《コスモ俱樂部小史》，《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期の政治と社会》，第413—448页，みすず書房2014

年版。

[52] 田汉还参考了北泽新次郎的《劳动者问题》。北泽新次郎:《労働者問題・上巻》,同文馆1919年版。

[54] 张牛:《“五四”运动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第200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55]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续)》; Samuel Smiles, *Life and Labour: or, Characteristics of Men of Industry, Culture, and Genius*, London: John Murray, 1931, p. 194.

[59]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续)》; 厨川白村:《精细なる周囲の描写》,《近代文学十講》,第329页,大日本图书1912年版。

[60] Émile Zola, *Le roman expérimental* ((5e édition), Paris: G. Charpentier, 1881, pp. 227-233.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

[61] 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它:复黄日葵兄一封长信》,《少年中国》1920年第1卷第12期。

[62][63] 田汉:《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续)》,《民铎》,1919年第1卷第7期。

[64] 武者小路实笃:《桃花源》(三幕剧),田汉译,《醒狮周报·文艺》,1924年11月,第5—7号。

[65] 田汉的《到民间去》(一名《坟头之舞》:南国电影剧社将摄制之影片),《申报》(本埠增刊),1926年5月14日,第23版。

[66] 田汉:《到民间去(一名〈坟头之舞〉)》(续),《南国特刊》,1926年3月第24期,第6版。

[67] 田汉:《到民间去(一名〈坟头之舞〉)》,《南国特刊》,1926年3月第23号,第6版。

[68] 祁建民:《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与新村主义》,《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69] 田汉在书中提及他参考了 Mrs. Townshend 的 *William Morris and the Communist Ideal* 和 Bruce Glasier 的 *William Morris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等著作。

[70] 卢敏芝:《“艺术的社会主义”:田汉、南国运动与左翼世界主义视野下的唯美主义艺术实践》,《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9年1月第68期。

[71] 田汉:《上海》,《南国月刊》1929年第1期。

[72] Ruth Kinna, “William Morris: Art, Work, and Leisu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1, no. 3 (2000): 493-512.

[73] William Morris and A. L. Morton, *Political Writings of*

William Morris, London: Lawrence & Wisheart, 1984, pp. 57-100.

[74][75][76][77][79] 田汉译:《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第45页,第26页,第25页,第11页,第46页,上海东南书店1929年版。

[80] 《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李怡主编,第312页,巴蜀书社2013年版。

[81] 平林初之辅:《自然主义文学底理论体系》,陈望道译,《文艺研究》1930年第1期。

[82]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第2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83] Liang Luo, *The Avant-garde and the Popular in Modern China: Tian Han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Performance and Politic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 59.

[84] 葛飞:《戏剧、革命与都市旋涡——1930年代左翼剧运、剧人在上海》,第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田汉:《艺术与艺术家的态度》,《田汉全集》(第15卷),第21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85]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第47—48页,台北城邦文化2003年版。

[86] 小谷一郎:《创造社研究—创造社と日本》,第56—63页,汲古書院2013年版; Laikwan Pang, *Building a New China in Cinema: The Chinese Left-wing Cinema Movement, 1932-1937*,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pp. 141-196.

[87]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35-136; “世界主义”曾被当作“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罗志田:《涟漪重叠:“五四”前后面向世界倾向的延续》,《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第147页,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版。

[88] 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第17—1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9] 田汉:《蔷薇之路》,第76页,上海泰东书局1922年版。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